



清华校史丛书

人物誌¹



清华大学出版社

K825.46
QHD/1-1

清 华 校 史 丛 书

人 物 志

第 一 辑

清华大学校史组编



003763

清 华 大 学 出 版 社

1 9 8 3 年 4 月

清华校史丛书
人 物 志 (第一辑)

清华大学校史组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 清华园

清华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5 字数: 150 千字

1983 年 4 月第一版 1983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00

统一书号: 7235·4 定价: 0.70 元



海淀走读 0035866

编 者 的 话

《人物志》是我们计划编印的《清华校史丛书》的一种，内容专门收集介绍与清华有关的、又在我国政治、经济，特别是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事业发展中产生过一定影响的人物的事迹。

编辑出版此书的目的是：一方面力求为研究这些人物提供较为翔实的史料；另一方面，也为对青年进行生动具体的爱国主义等方面的教育提供一种辅助材料。

本书将陆续编辑出版。第一辑所收文章，除吴晗《拍案而起的闻一多》、楼庆西《梁思成》、黎诣远《刘仙洲》和周擷清《毕生致力于科教事业——庄前鼎教授的事迹》外，其余均为两年来我们在整理研究清华校史的过程中，或与人合作，或个人执笔撰写的。其中大部分已先后在《人物》、《革命文物》、《战地》等书刊上发表过，这次收入本书时又作了必要的修订。

本辑由清华大学校史组编，在编撰过程中，曾得到许多老校友、老教授和革命前辈的大力支持和热情指导，谨致以衷心谢意。由于我们水平所限，错误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指正。

目 录

刘仙洲	1
张子高	24
梁思成	36
马约翰	59
清华留美学生中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施滉烈士	70
以振兴中华为己任——清华学运先驱者冀朝鼎	77
拍案而起的闻一多（吴晗遗作）	86
清华学生时代的闻一多	92
朱自清先生留下的珍迹	122
一溪明澈流动的清水——谈朱自清和他的治学精神	130
毕生致力于科教事业——庄前鼎教授的事迹	137
吴晗与清华	152
洪深学生时代的戏剧活动	157
勤奋好学的张荫麟教授	162
陈寅恪事略	167
王国维与清华国学研究院	180
一代学人赵元任	184
碧血溅都门，丹心照清华——“三·一八”烈士韦杰三	192
“一二·九”运动中的英男女战士纪毓秀	196
壮烈牺牲堪悼惋，英名万古长留存 ——记“一二·一”运动中的女烈士潘琰	200

刘 仙 洲

黎 诣 远

一九七五年九月底。在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十二号内科病房里，八十五岁高龄的刘仙洲，已被胰腺癌折磨得一连几天未吃东西，仅靠输液维持着生命。

当时还戴着“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帽子的刘仙洲，想到自己尚未写完的《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睁大眼睛说：“不吃不行，我还得吃，我还得写！”说罢，要了一碗麦乳精艰难地咽了下去。



第二天是国庆，刘仙洲格外兴奋。他让护士帮助半卧着，手执放大镜阅读文献，用发颤的笔修改文章。但当他吃力地写下一个“燕”字后，就再也提不动笔了——这是生平著述三百万字的刘仙洲，为我们写下的最后一个字。以后，他便逐渐昏迷，于十月六日与世长辞。

晚年，这位中国著名的工程教育家和机械工程学家，曾经用六个字概括自己的一生：读书，教书，写书。他除了十八年

大学校长外，读了二十年书，教了三十年书，写了二十本书。也可以说，他是读了一辈子书，教了一辈子书，也写了一辈子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从同盟会员到共产党员

刘仙洲原名鹤，字仙舟，一八九〇年一月二十七日，生于河北省的一个农村——完县唐兴店村。

刘仙洲的学生时代，正是甲午战争之后清朝日益丧权辱国，人民奋起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岁月，他清楚地记得八国联军是怎样侵入他的家乡，横冲直撞，烧杀掠夺的。他的私塾老师，曾经参加过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他的许多中学老师，也是孙中山创立的同盟会会员。从这些老师那里，他不仅学到了扎实的基础知识，也受到了反帝爱国的启蒙教育。

一九〇六年，刘仙洲以第一名成绩考入当时完县唯一的高等小学，并被同学选为班长。校长是一个中过举人的劣绅，竟贪污学生的伙食费。刘仙洲便带领同学向县长呈文控告，闹起学潮，结果被校长开除五人，刘仙洲名列第一。

一九〇七年，刘仙洲改名振华，考入保定崇实中学。由于他勤奋刻苦，品学兼优，又被选为班长，并于一九〇八年春率先加入同盟会，负责秘密宣传组织工作，开展“抵制洋货”，“召开国会”等学生运动。同年秋，校长以“阅读禁书”为借口，记一盟员“大过”。刘仙洲又带领同学闹起学潮，罢课离校，结果被校长开除七人，刘仙洲又是名列第一。

随后，刘仙洲转入由同盟会河北省支部主盟人陈幼云创办的育德中学继续学习。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育德中学成为保定一带革命运动的指挥部。刘仙洲冒着生命危险，先后参加燕晋独立和保定、蠡县、满城、完县、石家庄等地的革命暴动，

并带领几位同学试制炸弹，去炸京汉铁路唐河大桥，以阻止清军南下镇压革命军。一九一二年初，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当了临时大总统，刘仙洲又奔赴山西太原，参加“倒袁”运动。

在太原，刘仙洲接到许多师生来信，希望他继续求学，他想起尊敬的老师陈幼云临终前对他的嘱咐：“将来的革命工作，主要是你们青年的责任，……你们应当在学习上努力，多作准备”。他又听到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谈到学术对民族的重要性：“英人对于莎士比亚与五印度，倘二者不可得兼，则必舍五印度而要莎士比亚”。他深深感到：“欲求国家各种事业之独立前进，非先求各种学术之独立发展不可”，从而下定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决心，返校继续读书。

一九一二年夏，刘仙洲在育德中学毕业，中学五年总平均成绩高达 96.4 分。一九一三年春，他以第一名成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实部（理科）。一九一四年夏，他又考取了河北省公费，去香港大学学习机械工程。他的大学毕业试卷，经伦敦大学审查，获得“头等荣誉”毕业文凭，授予工程科学学士学位。

一九一八年夏，刘仙洲从香港大学毕业，当局本来准备保送他到英国留学，河北省高等工业学校以一百五十元的月薪聘任他为机械学讲师，但为了大批清寒有志青年出国深造，他毅然回到保定母校育德中学，担任留法勤工俭学高等工艺预备班的机械学教员。育德中学校长王国光与他商量：月薪只给八十元行不行？刘仙洲当即表示：“我为母校工作，钱多少无所谓”。王国光马上说：“既然无所谓，那么再少给一半，月薪就四十吧！”后来，王国光在谈到这件事时说，“我们要为祖国成就一件事，必须有积极性与创造性。遇有必须牺牲个人利益时，就不能不仿效刘仙洲同志为成就勤工俭学事业而抛弃个

人比较高级的地位和待遇的牺牲精神”。

一九二四年，三十四岁的刘仙洲，担任我国最早开办的北洋大学校长。到任一年，他就在校庆三十周年时提出今后十年“理想中之将来扩充计划”，决心“造就‘东方麻省理工大学’之始基”。北洋的教授，原先几乎都是外国人，他先后聘请学成归国的茅以升、石志仁、周承佑、侯德榜等来校，各系课程差不多都由中国学者自己讲授。当时，北洋军阀忙于混战，四年中只拨给两年经费，学校往往连薪金都开不出。刘仙洲带头不拿或少拿薪金，（四年少拿薪金五千余元），与全体教工同甘共苦。刘仙洲长校期间一直在校学习的魏寿昆，在《北洋大学的回忆片断》一文中说：“大多数毕业生对刘校长的评价都是有口皆碑。他在北洋四年，是呕心沥血、惨淡经营的四年，是继往开来，中流砥柱的四年”。但是，一九二八年国民党占领京津以后，竟千方百计加以刁难，变本加厉，尅扣经费，甚至指使歹徒持枪拦路威胁。刘仙洲愤然辞职，去东北大学任教，决心不与国民党合作。他当时用名刘振华，因一个国民党军阀叫刘镇华，他就改用刘仙洲，不屑与之同音。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军占领沈阳，刘仙洲从东北大学转到唐山工学院，后到北平清华大学任教。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日军占领北平，他又只身南下，奔赴长沙临时大学，梧州广西大学，最后经过“一室之中，同住人猪鸡狗；十天以内，历经春夏秋冬”的长途跋涉，到达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在抗战大后方坚持教书。当时，生活非常困难。刘仙洲担任“部聘教授”，虽然每月额外津贴二百元，一年下来也只够买一枝毛笔。但他安于清寒，自己洗衣。他非常想念留在北平的母亲，每当一位酷似其母的老太太经过他住的望苍楼，他就觉着是见到了母亲；母亲想他也快想疯了，在北平见到背

影像他的人，就立即把人家叫住。看到别人返平探亲，刘仙洲多想也回平看看年迈的母亲！但他热爱母亲，更热爱祖国。抗战八年，他一直坚守岗位，未离一步，人称“爱国公真陆放翁”。

通过八年抗战，刘仙洲进一步看清了国民党的腐败。在西南联大，一天正在上课，楼下突然有人高喊：“同学们快下来参加游行！”由于刘仙洲平日要求严格，没有人敢擅自下去。这时，刘仙洲问：“干什么游行？”有人回答说：“打倒孔祥熙！”刘仙洲马上表示：“打倒孔祥熙可以，大家去吧！”于是，同学们全都下楼参加了游行。当时，国民党派要人动员十几位知名的老教授加入国民党，遭刘仙洲拒绝后，竟擅自从他的薪金中扣除“党费”。刘仙洲立即写信提出抗议，之后，国民党又派人再次动员他说：“你是同盟会员，参加国民党是理所当然的事！”刘仙洲当即严词驳斥说：“我们当初加入同盟会，正是为了打倒像你们这样的作风！”有人曾好心地劝他：“为人要‘内方外圆’”。他说：“我看不对，应当‘内方外也方’！”抗战胜利后，刘仙洲路过南京，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特意宴请他，要他再次出长北洋大学。他连夜离开南京，北上清华，拒不赴宴。不久，教育部不经刘仙洲同意，公开发出这一任命，他拒不赴任。后来朱家骅再电刘仙洲“敦促”，教育部督学吴兆棠、青年部长陈雪屏等并登门“劝驾”，但他“辞意极坚，学校转送之教部函件，均遭到刘氏退回”。《联大八年》曾评论说：“正当有人想出任或出长某院某系的时候，刘先生却是请都请不出。”

一个二十年前当过北洋大学校长，从事教育救国三十年的人，为什么竟如此执拗呢？原来，刘仙洲从切身经历中得出结论：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下，科学救国，教育救国这条路是走

不通的。他抚今思昔，心灰意懒，“私心以为在我的一生中，国家是没有改好的希望了”。他自己盘算过，也向朋友们公开讲过：“我剩下的一段时间，顶多再教十年书，再写五本书，就算尽了我一生的责任了。”正因为如此，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后，自然科学界代表大会提名刘仙洲为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他当场两次声明不愿当选；人民政府请他担任教育部副部长，他也婉言谢绝。

但是，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是勇于追求真理的，也是乐于接受真理的。解放后的第一个春天，刘仙洲应邀参加华北农业部关于试验制造水车问题的座谈会，会议宣布：“要在一九五〇年推广十万辆水车，为华北人民解决春旱问题”。这正是他三十年来梦寐以求的宿愿。第二年春天，他参加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心议题又是河防水利和生产救灾问题。接样，他又听到毛泽东同志关于“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等一系列号召。所有这些，在这位老人心中的感触是特别深的。他说：“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政府和过去的反动政府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她是言行一致的，她的一切规划和措施都是为人民的。由于这些事实，我对中国共产党发生了很高的信仰。”他觉得自己在黑暗中探索了半个世纪，“走了许多弯曲艰难的道路，最终走到一条光明大道上来了”，“自己的思想进入了一个新境界，仿佛一下子又变成了青年。”

中国共产党重新唤起了这位年过花甲老人的生活斗志，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改造世界观，决心“也要一步不停地向着共产主义迈进”。一九五二年，刘仙洲愉快地接受了教育部的任命，担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并立即提出了十一条治校方案。他坚决依靠党的领导，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与校党委紧密配合，从学制的长短，专业的设置，

教学的作风，教师的科研，学生的红专一直到校园的绿化，事无巨细，一一过问，把自己丰富的教育经验给了社会主义的清华大学，与此同时，他还担任了历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常务委员，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农业机械学会理事长等职。由于他对新中国教育事业和科学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特地邀请他参加最高国务会议。

一九五五年，刘仙洲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是全国解放后最早入党的知名老教授；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从入党的第二天起，他先后接到了从七十岁的老同盟会员到十七岁的青年学生自国内外发来的数以百计的贺信、贺电。他的学生章文晋等三人，在长达四页的贺信中说：“您以六十五岁的高龄得到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这是党对您一生为人、为事，特别是近几年的努力和贡献的巨大评价，我们为此而高兴，我们也为党获得像您这样的优秀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做党员而高兴。”有的人含着热泪反复阅读刘仙洲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我为什么加入中国共产党》，感到自己又像几十年前在课堂上听他讲课一样，并在来信中说：“这一次，您又以自己的亲身体会和模范行动，教诲了您遍布全国的学生。”曾与刘仙洲长期共事，并介绍他入党的蒋南翔，在回顾他从同盟会员到共产党员的历程后说：“刘仙洲的入党说明了一个真理：即使在旧社会幻想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科学家，只要他真正忠于人民，拥护真理，最后也会通过曲折的道路找到共产党，走向共产主义。伟大的共产党，是先进的爱国的科学家在政治上的光荣归宿。就刘仙洲的一生来说，也是在解放以后，特别是入党以后，对人民的贡献最大。这就证明：科学技术与政治应当而且必须建立正确的关系。科学技术必须同政治结合，必须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想领导，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因此，刘仙洲在解放以后所走的道路，也是出身旧中国的广大爱国知识分子所要走的道路。

工程师的工程师

在工程教育思想上，刘仙洲一贯主张理论与实际联系，学理与实验并重。《公羊传》说：“巧心劳力成器物曰工。”刘仙洲觉得这个“工”的定义下得最好也不过了。他说：只“巧心”而不“劳力”，是只有学理而无实验，充其量不过是一位理论的工程家，可以做文章，可以勉强教书，但一遇到具体问题，就难免不切实际；只“劳力”而不“巧心”，是只有实验无学理，充其量不过是一位熟练的老工匠，可以按图制造，可以照着仿做，但一问其所以然，则茫然不知。而一般造就工程人才的办法，不外乎是在学校里附设实习工厂，使学生于学理以外，兼得实验，或者在工厂里边附设补习学校，使工人于工作以外，兼得学理。刘仙洲认为：这两种办法虽然也可以造就相当的工程人才，但究竟偏于学理或偏于实验，有时学理自学理，实验自实验。因此，他根据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的经验和自己在保定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的经历，三番五次倡导“工读协作制”。

刘仙洲在一九二〇年《我国工业教育应酌采工读协作制意见书》、一九二五年《北洋大学附设工读协作制机械工学门意见书》、一九三七年《我国机械工程教育应改进的几点》、一九四三年《培植我国工业建设人才的具体计划》等一系列教育论文中，反复论述了这种《工读协作制》的优点。他说：“工读协作制”，是按照学校附设实习工厂和工厂附设补习学校这两种办法，各取所长，各去其短，在学校求理，在工厂求实验，把学校和工厂合于一气，把学生和工人备于一身，用最经

济的办法造就学理与实验兼优的工程人才的一种教育制度。这种教育制度不同于勤工俭学，勤工俭学是把学和工分成两个阶段，先做几年工，积蓄下钱，再去读书，而且所做的工，对于所读的书，不一定有什么关系。“工读协作制”所做的工，则力求和他所读的课程有关，课程的分配也力求和他所做的工接近，因此比勤工俭学更好。它不仅可以解决大批清寒子弟学习深造的困难，而且有助于纠正工程学生以下两种通病：一是注重书本，轻视实习；一是自视颇高，不肯轻于向工人请教。实行“工读协作制”，学生和工人一样勤勉，一样待遇，可以去掉骄气，不耻下问。

刘仙洲曾多次拟就“工读协作制”的具体实施方案，呈请教育当局核准实行。但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害怕学生与工人结合在一起，都以“留备采择”为名，不了了之。

在反复倡导“工读协作制”的同时，刘仙洲一直呼吁采取切实措施，加强学校工程教育与生产实际的联系。他指出当时工科大学偏重学理，忽视实习的七种表现，主张特别注意实习教授人选，扩大实习工厂，充实实验设备，增加实习钟点。一九三〇年，他在自己负债的情况下，一个人捐款三百五十元，为育德中学添置实验仪器。他在自己讲授《机械原理》等课程时，先后试验过《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教学法》，让学生在听课的同时，观摩和接触实物。一九三五年，他在《机械工程及其研究法》一文中指出：研究机械工程学，非常常接触实物不可，最好能有机会亲近机械，抚摸它们，使用它们，如果情况允许的话，更要拆卸它们，安装它们。“这样做，你的衣服也许弄上油，你的脸上也许擦上黑，若钻到一个锅炉的焰（烟）道上去考察，你身上更无疑的要弄上不少的灰尘。然而，你千万不要嫌恶它，你应当觉着这样是最美！比穿上漂亮的衣服，甚

至比擦上雪花膏美的多！”

正是从学理与实验兼优的思想出发，刘仙洲还主张理工合校。他在出长北洋大学时，曾计划把该校办为理工大学。他说：“工科为理科之实用，理科为工科之根基”。“工科同时兼办理科，则凡工科各学门之根基，可由理科教授担任之，其程度自易提高；凡理科各学门有需实物以证明者，可由工科之设备参考之，其观念自易于明了也。”

全国解放以后，刘仙洲对于加强理论与实际联系的一切方针和措施，都积极贯彻执行。在一九五二年学习苏联进行教学改革时，他很赞成在加强基础理论课的同时，增加专业实验、生产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等，认为这些实践环节有助于改变过去理论脱离实际的现象。在一九六四年刘少奇提出“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以后，刘仙洲很赞成在继续办好全日制学校的同时，大力发展半工半读的教育制度，并抱病参加历年半工半读班的开学典礼。对于一九五八年的教育改革，刘仙洲起初也很赞成，曾在中央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负责人座谈会上第一个发言，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七种方式。但是，不久出现过分强调生产劳动的现象，如有的提出以生产为主，大砍理论课程，甚至整个学期都不上课。刘仙洲坚决反对这种削弱理论教学的倾向，他说：“学校总还是学校，应该以教学为主。学校，工厂，科学院各有自己的任务，应该有所分工。不能同时都搞教学，科研，生产这三项任务。”一九六〇年，有的人搞什么“学术批判”，要“批倒、批臭 马克斯威尔。”刘仙洲当面问道：“马克斯威尔，你打得倒吗？我看不行！”当毛泽东同志提出要使学生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发展时，刘仙洲认为应该全面理解这句话的精神，不能片面地抓住一两句话就做。对学生“可以不上课”，考试“可

以曾名顶替”，要停课“参加四清”等，他都提出不同意见，说“这样会走向反面”。

在教学作风上，刘仙洲素以严格认真著称。二十年的在校学习，只是刘仙洲一生读书的开始，大学毕业教书以后，他也从来没有放松读书。他既不抽烟，也不喝酒，买书、藏书、读书就是他生平唯一的嗜好。无论在国内或到国外，每到一地，必到各种书店和博物馆收集新旧文献资料。北京的琉璃厂、隆福寺等处几十家旧书店，每年春节的厂甸，刘仙洲更是常客，每去必满载而归。他的老朋友张荫麟，也常常去这些地方。因为两人都只顾“物色”好书，往往各抱一大堆挤到一起，抬头一看，才发觉原来是老朋友。走进刘仙洲寓所，就像来到一片书店：楼上楼下，东墙西壁，全是藏书。就连走廊椅角，卧床后面，也摆满书架。在这上万册藏书中，很多都夹上纸条，或带有圈点，说明刘仙洲是仔细读过的。每天，他除了教书，写书，就是读书，即使星期天、寒暑假也不例外，终日手不释卷。读书，也是教书、写书的基础。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正因为刘仙洲认真读书，坚持读书，才能先后开出十几门课程，才能写出成百万字的著述。刘仙洲的妻子，经常以“没有星期天的爸爸”教育子女，要他们像爸爸那样，读一辈子书。

刘仙洲每周担负十二小时讲课任务，从不迟到，从不轻易缺课，经常做到全年一课不缺。他总是天一亮就起床备课，遇到比较复杂的图，就提前到教室画好，甚至前一天晚上就去画好，而且尽量用不同颜色的粉笔画，以求层次分明，他的讲课，深入浅出，组织严密，条理清晰，很好笔记。每个章节的内容，都能按时讲完，不拉进度。他的板书（黑板字）也极其工整，一丝不苟，就像刻腊纸一样。许多学生觉得他字母 f 写

得很漂亮，纷纷学着写，有的至今还保持着这种“刘体”的写法。

刘仙洲律己以严，对学生也严格要求，他把严格的科学作风作为工程师的基本素质，在教学过程中精心加以塑造。布置作业时，他明确规定纸张规格、作图比例、中心线位置、各种线条的颜色及其粗细等，不符合要求就打回重做。有个学生计算飞轮的半径，把小数点错移一位，1.2 呎变成 12 呎。刘仙洲发现后，当场把这个学生叫起来问道：“这间教室有多高？你的机械在一般厂房里能搁得下吗？”接着，他花了一刻钟时间又反复论述了科学作风的重要性。刘仙洲还规定，考试必须按时交卷。有一次，一个学生到时迟迟不交，一直到老师跨出教室门以后才追上来，刘仙洲就把卷子撕了。从此以后，大家养成了准时的习惯。

关于刘仙洲的严格认真，还流传着下面这样一些小故事：

——每天生活极有规律，看书、备课、写作都有严格计划。如遇来客耽误进度，当晚必定都补上，不完不睡。

——每天散步的时间、路线、距离，也有一定之规。一次，门卫见他突然改变散步路线，就问：“刘校长照例要出校门散步，今天怎么变了？”他说：“我忘带校徽了！”

——所借图书，凡有卷角的，都逐页用手拈平再还。他自己的上万册藏书，也没有一本带卷角的。

——凡是他手里的钞票，只要有破的，都裱好以后，才用出去。

俗话说：“严师出高徒”。刘仙洲在十几个学校从事教育工作的五十多年，以严格认真的教学作风，培养了中国几代机械工程人才，桃李满天下，在一九六二年召开的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十周年大会上，到会的厂长、总工程师中，不少人都是他